

第二讲 日出东方：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巩固新生政权、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并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胜利，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随后，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针，中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导入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行动纲领，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到1949年9月，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攻势作战，把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压缩、分割在西北、中原、华北、华东、东北五个战场上，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解放了东北、华北、中原和华东广大地区。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随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基本条件。

在政治方面，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不断扩大，并在各地逐步建立起人民政府。1948年9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以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完成华北区的统

一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卓越工作，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并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各解放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职工、妇女、青年、学生及文艺工作者也先后召开了代表大会。全国科学、新闻、教育界代表以及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了筹备会，准备成立各自的团体。成立全国统一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共同选择。这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经济方面，解放区不断扩大，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土地，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开展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的工作。同时，还充分利用私人工商业增强了经济力量。

在国际方面，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苏联只用几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国力不断增强。在东欧和亚洲也相继出现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同时，斯大林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成立，承诺苏联承认新中国，并答应给予相当于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即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毛泽东指出，因为新政协已经具备人民代表会议性质，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以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举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的任务是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组织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空前盛会。

9月27日，大会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最终确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会还通过四项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视频：《手语版国歌》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订

制定一部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接受和遵守的共同纲领，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基础性工作。9月29日，大会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条，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政策作出明确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任务，明确了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基本任务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同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第二，规定了国家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共同纲领》还规定采取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结构形式。

第三，规定了同国体、政体相适应的、适合中国特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组织成分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四，规定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即“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用调剂的政策，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五，规定了文化教育、军事以及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国家的军事制度是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维护各国人民间

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各国政府发展经济贸易。

（三）开国大典和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组建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全体政府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

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军民参加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军乐团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中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傍晚，开始群众游行，工人、农民、学生、市民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1949年10月1日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开国大典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立即着手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等组织机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及所辖委、部负责人名单。10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第一次扩大的政务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下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共设30个工作部门，其中有关财政经济的部门有16个。11月1日，政务院及所辖委、部、会、院、署、行开始正式办公。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这既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国家政权的根本属性，也体现了统一战线政权团结合作、政治协商的人民民主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得到良好的贯彻实行。

视频：《开国大典》

（四）开辟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使中华民族一洗百余年来蒙受的耻辱，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的振奋，中华民族从此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为建设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的成立，迅速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区域以外）的国家统一，形成中华民族的真正统一和空前团结的局面，标志着中国由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真正统一的国家。

第三，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次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从此建立起来。

第四，极大地增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在约占世界人口1/4、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三的中国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并将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大大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冷战格局中的力量对比，鼓舞并支持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对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一）向全国的胜利进军

新中国成立时，国民党正规军已大部被歼灭。但仍有一些地方被国民党军队所占据。中共中央指挥人民军队迅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大陆和部分沿海岛屿，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1949年10月1日，朱德发布了“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的命令。20日，简称中央军委举行第一次会议，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尚待解放地区进军和今后建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采取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围、不使残敌漏网的作战方针。随后，各野战军分别向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发起猛烈的围歼战。

在华中、华南战场，第四野战军（辖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分三路挺进湖南、广东。10月14日，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解放。11月6日，解放了广西全境。在华东战场，第三野战军于9月19日发起漳厦战役，解放了厦门全岛、鼓浪屿，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随之全部解放。在西北战场，1950年新疆全境解放。在西南战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0日，蒋介石逃往台湾。随后，二野完成了向成都合围，歼灭了国民党军最后一支主力部队胡宗南集团。西南地区除西藏外全部宣告解放。

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解放海南岛和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役。4月16日晚，第四野战军强渡琼州海峡，在海南岛琼崖游击纵队接应下，迅速突破敌军防线。5月1日，

海南全岛解放。从5月下旬到8月初，全部解放位于广东珠江口外香港、澳门之间的万山群岛。同时，5月16日，第三野战军在舟山本岛登陆并解放周围诸岛。

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重要部署，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主力部队150余万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经过大举进剿、重点清剿和肃清残匪等阶段，到1951年上半年，大陆的匪患基本上平息。根据“除恶务尽、

留后患”的方针，一些地方肃清残散土匪的斗争持续进行到1953年。经过三年多的剿匪斗争，共歼灭土匪特务武装和争取匪特投降自新260余万人，有力地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结束了中国匪患久远、为害甚烈的历史。

（二）和平解放西藏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待解放的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由印度等地两次侵入西藏，并培植亲英分裂势力，处心积虑地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1949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制造了“驱汉事件”，企图乘国民党政权覆亡之机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打出所谓“西藏独立”的旗号。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完成对全国大陆的解放任务，1950年1月初，中共中央作出进军西藏的决策，随后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6月，西藏地方当局拒绝中共中央提出的十项谈判政策也并向昌都地区增兵，企图阻挠人民解放军进藏。10月，为了打击西藏上层集团中的分裂势力，争取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多人，昌都宣告解放。1951年4月29日，以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经过反复谈判和协商，于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进驻拉萨。

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策划“西藏独立”的迷梦，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逐步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开展西藏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迅速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步骤和关键所在。新中国国营经济的建立，主要是从接管城市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入手的。

根据官僚资本企业的经济属性，中共在总结东北、华北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于1949年1月15日发布《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4月2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两个文件明确规定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首先，严格区分官僚资本企业和一般私营企业的界限，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切实保护私营企业。其次，严格规定接收官僚资本企业采取与对待旧政权不同的办法，即打碎它们的机构，而是保持其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

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2月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没收官僚资本的范围和具体做法。根据上述方针，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便由军管会派出代表，按该地区官僚资本企业的原属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地先接收下来。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建立起来，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建立，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为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创造了物质前提。

三、社会改革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一）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农民贫穷和农业生产落后的总根源，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2/3的地区、2.9亿农村人口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没有废除，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拥有耕地总数的14%，他们所承受的地租剥削是很沉重的。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也是建设新中国的最大障碍。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是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明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策和部署，提出土改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3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地改革法》），作为在全国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

同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相比，《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地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首先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然后是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最后进行复查和动员生产。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同老解放区在内，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共没收征收了7亿亩（约合4700万公顷）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免除了土地改革以前农民每年向地主缴纳的高达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

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最重大最彻底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性标志。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二）进行民主改革，荡涤污泥浊水

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废除封建把头制、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清除黄赌毒等民主改革也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入展开。从农村到城市，从工矿企业到机关学校，整个社会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50年起，各国营厂矿在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基础上陆续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制等旧制度。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要求对工厂、矿山和交通等企业部门首先对国营工矿交通等企业内部的残余反革命势力进行系统清理，并对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各厂矿企业通过发动群众，对大把头、大恶霸依法严惩；对一般把头则经过教育待其认清罪行后，安排适当的工作，但不得任生产领导职务同时，普遍建立新的生产管理制度；建立经济核算制、大力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通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彻底铲除了工矿企业中残余的反动势力，废除了各种压迫工人的旧制度，初步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

改革封建婚姻制度，是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4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自5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家庭关系的根基，也从根本上变革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特别是使广大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和提高社会地位，是几千年来中国家庭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一次重大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还迅速开展了扫清旧社会痼疾的斗争。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率先通过决议，作出了封闭一切妓院，集中审讯处理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对妓女进行思想改造、帮助其重新从事生产的决定。当天下午北京市封闭了全市224家妓院，惩治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妓院老板，使大批被迫为娼的妇女脱离苦海。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还开展了禁毒运动。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随后，全国禁毒运动逐步展开。到1952年底，在旧中国肆虐的毒品祸患基本禁绝。此外，政府还开展了严禁赌博活动的斗争。经过三年的努力，通过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民主改革运动，曾在旧中国屡禁不绝、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娼、毒、赌等社会痼疾基本禁绝，明显改善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给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和社

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三）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

正当中国人民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并将干涉的范围扩大到朝鲜以外的亚洲地区。26日，美国调动空军和海军侵入朝鲜，支援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作战；同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进犯。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于10月1日、3日先后致函并派专使当面向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当时的中国经济恢复刚刚开始，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甚为困难。而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中国如要出战，所迎击的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使国内经济建设不能正常进行？这些都是必须严肃考虑的重大问题。

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最后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19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丹东、长甸河口、集安跨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战场，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7月，是中朝军队实施战略进攻与稳定朝鲜战局阶段。中朝军队先后发动五次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使美国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根据中、朝、苏三方协商提出的停战谈判建议。第二阶段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是边打边谈阶段。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全国人民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案例：从故事中领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下面我们从5个故事中领略抗美援朝精神。

毛岸英带头报名、勇上前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各地党组织对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大规

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广泛开展了支援志愿军的活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谱名远仁，字岸英，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与其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的长子。1950年10月，党中央与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彭德怀，便要求入朝参战并得到毛泽东支持。毛泽东对毛岸英疼爱有加，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不同意毛岸英赴朝鲜战斗，毛泽东回答“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在毛岸英苦苦追随以及毛泽东的多次劝说下，彭德怀同意了，随后他到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1950年11月25日上午，毛岸英因回指挥部取作战图，被凝固汽油弹击中，壮烈牺牲。毛岸英阵亡后，彭德怀将此事电告周恩来，1951年1月2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等人向毛泽东报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毛泽东抽起香烟，沉思许久才说：“打仗嘛，总难免要有牺牲。”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典范和楷模，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牺牲了包括妻子在内至亲至爱的五位亲人，为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他又把最疼爱的长子毛岸英送来朝鲜。

黄继光英勇顽强、舍生忘死

黄继光（1931年1月8日—1952年10月20日），民族英雄。1952年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第2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必须在天亮前占领阵地，为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联合国军设在山顶上的集团火力点，压制住志愿军反击部队不能前进。营参谋长命令第6连组织爆破组炸掉它。第6连向敌军发起五次冲锋，未能摧毁敌军火力点，而且一个又一个战友倒下去。

这时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时间就是生命。在这关键时刻，站在营参谋长身旁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他掏出早已写好的决心书交给参谋长，恳切地说：“把任务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黄继光在决心书上写道：“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营参谋长转过身，沉思片刻，面对黄继光坚定地说：“黄继光，这次任务就交给你。我任命你为第6连第6班代理班长，一定要完成任务。”参谋长当即任命黄继光为6班班长。黄继光接受任务后，立即提上手雷，带领两名战士向敌军的火力点爬去。他们在照明弹的亮光下巧妙地前进，当离敌军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时一名战士牺牲，另一名战士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打穿，血流如柱，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毫无畏惧，忍着伤痛，仍然一步不停地向敌军火力点前进。在距敌军火力点八九米的时候，他举起右手将手雷接连投向敌军，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地堡内的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志愿军反击部队的冲锋受到阻止。这时，黄继光再次负伤倒下。天就要亮了，这时黄继光身边已无弹药，身体又多处受伤，他顽强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刹时，敌

军正在喷吐的火舌熄灭，正在吼叫的机枪哑然失声。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高喊着“冲啊！为黄继光报仇！”踏着黄继光爬行过的道路，很快占领了阵地，全歼守军两个营。

1952年10月，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为战士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黄继光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革命英雄壮举，激励和教育了几代人。他那奋不顾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人们所景仰所传颂。

张桃芳刻苦训练、机智杀敌

70年前，志愿军与敌人在国力、军力和装备方面相差悬殊。仅以钢铁产量为例，1950年新中国才年产61万吨，不到敌人的零头。中国人民被迫进行了一场“钢”与“气”的较量，却以“钢少气多”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广大志愿军将士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高昂士气，刻苦训练，英勇杀敌。张桃芳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士。

张桃芳（1931年—2007年10月29日），男，江苏兴化人，抗美援朝志愿军狙击手，1951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9月参加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他所在的24军72师第214团一开始驻防在朝鲜的战略要地元山。张桃芳所在的部队到达前沿阵地时，抗美援朝战争已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当时敌军凭恃先进的装备，时常炮轰我前沿阵地，在白天堂而皇之地晒太阳、打扑克、跳舞，根本不把中朝军队放在眼里。于是上级指示：“组织特等射手展开狙击作战，打击敌人的猖狂气焰。”张桃芳领到一支苏联制造的莫辛—纳甘步枪。虽然莫辛—纳甘适宜在严寒天气使用，但它是非自动步骑枪，每扣一次扳机，都要再拉一次枪栓，才能再打。加上它的枪管比较短，子弹的散布面较大，后坐力大，没有经过刻苦训练，很难精准命中目标。就连张桃芳，在第一次用它进行实弹射击测试时，也是三发子弹脱靶。但这并没有令张桃芳气馁。他所在连队坚守的阵地，就是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牺牲的597.9高地。到达高地的第一天，张桃芳就坚持让班长带他去看一看黄继光牺牲的地方。他放眼望去，看到的却是满目荒山，弹坑密布。脚踏英雄牺牲的阵地，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替黄继光等英雄报仇，做一个英勇的战士。此后张桃芳像着了魔一样，整天端着空枪，反复练习举枪动作，瞄准远近不同的物体，不停扣发扳机，寻找感觉；他用破床单制成两个沙袋挂在手臂上练习臂力，练到最后，他两臂带着十几公斤沙袋时，仍能不差分毫地扣动扳机。夜晚，战友们常见到张桃芳拿着空枪在坑道中对着晃动的油灯练习瞄准。一段时间后，张桃芳找到了感觉。在班长的推荐下，张桃芳开始了自己的狙击生涯。那时没有专业的狙击训练，训练员把他们带到前沿阵地，现场教他们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许多人没想到，几个月前还打空靶的新兵，竟在不久后成为闻名军中的神枪手。张桃芳从熟悉阵地周围地貌特征入手，研究敌人的活动规律，将敌人常出没的道路估测好距离，在战壕中寻找理想的射击点。两个星期后，他适应了这种节奏，富有天

赋的他开始显露水平。接下来，他用240发子弹，击毙击伤了71个敌人。后来，张桃芳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全连头号狙击手。24军军长皮定均听说后，起初不相信这位新兵蛋子这么厉害，找了一位作战参谋，带上一对自己都舍不得穿的皮鞋，嘱咐参谋要亲眼看见他打中三个敌人就把鞋子送他，后来张桃芳就在这个参谋面前打中了三个美国鬼子。自从上甘岭的597.9高地出现志愿军狙击手后，敌军官兵再也不敢在前沿阵地晃悠。他们开始挖工事防备，工事建成后整天躲在里面不敢抬头，连大小便也用罐头装着，抛出工事外。难怪他们后来给上甘岭北山阵地起名为“狙击兵岭”。美军还专门调来了狙击手予以反击。张桃芳的这样一支连光学瞄准镜都没有的步骑枪，成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狙击手的标准配置。

现如今，这支步枪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注释说：“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使用它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1953年，志愿军总部为张桃芳荣记特等功，并授予他“二级狙击英雄”的荣誉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邱少云忍痛火烧、高度忠诚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志愿军战士，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无比忠诚，邱少云就是这样的战士。邱少云（1926—1952），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原四川铜梁县关建乡）玉屏村邱家沟。他9岁丧父、11岁丧母、13岁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第9连战士。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开赴前线途中，他冒着美军飞机的扫射轰炸，从燃烧的居民房屋里救出1名朝鲜儿童。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的部队接受了一件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在平康、金化之间的“391”高地上，消灭李伪匪军，将战线向南推进。

391高地处于上甘岭右翼铁源东北十余公里处，山势险要，狭长孤立，南北两峰相对全长1200米。高地上防守着敌人一个加强连，他们在高地上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布上了层层铁丝网。夺取391高地，最大的困难是，从我军阵地到该高地有3000米的开阔地。在这样长的开阔地上出击必然会造成突击力量过多的伤亡，影响战斗的胜利。为了拔掉这颗毒钉，消灭391高地上的李伪军，我志愿军某部领导机关派出侦察小组，对该高地上的地形地物、敌人的火力配备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在此基础上，我军领导机关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研究，决定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夜里，将数倍于敌人的兵力潜伏到敌人的前沿。10月11日傍晚，全副武装的三营指战员集结在蔓山区，随着师长的一声令下，潜伏部队像离弦的箭一样，直朝着敌人的前沿阵地射去。战士们经过了20公里的行程，于22时到达了预定潜伏区。24时，部队秘密地潜伏就绪。570多名志愿军战士成线网状密布在“三九一”高地前的草丛中。九连潜伏哨已前进到了距敌碉堡前500米处。邱少云潜伏在391高地东边距山脚只有60米的一条杂草丛的土坎边。他们用草布满全身，以免被敌军发现，不管天气多炎热，也不管草丛中的蚊虫叮咬，也纹丝不动。不久，山上的敌人向草丛中扔了两发指示目标的烟幕弹，浓烟刚起，敌人就乱扔燃烧弹。立刻，潜伏地区燃起几处大火，野草噼

噼啪啪地燃烧起来，火越烧越大。这时，敌机又扔下了一排燃烧弹，有一颗落在离邱少云2米远的地方，四散飞迸着汽油燃烧液，溅在邱少云的腿上。转眼间，他腿上插的伪装烧着了，火苗腾腾地往上冒，很快地变成了一团烈火把他包了起来。邱少云的身后是一条水沟，他只要后退几步，在泥水里打几个滚，身上的火就灭了。可是，只要他一动，敌人就会发觉。这时候，靠近邱少云的小李、小张和老王紧张起来。他们三人望着全身被烧着的邱少云，心里十分难受。烈火烧在邱少云的身上，就像烧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真想扑过去帮助战友把火扑灭呀。但是，他们克制住了极度的痛苦，没有那样做。因为敌人正从望远镜里观察着这片燃烧的土地，只要有丝毫的动静，敌人就会发现。这样，不仅救不了邱少云，潜伏计划也要落空，更多的战士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他们以邱少云为榜样，严守着潜伏纪律，等待着贡献时刻的到来。这时候，烈火从腿上已经烧到了邱少云的头上。他忍受着烈火烧身的难以想象的痛苦，立即把手中的爆破筒递给了身旁的小李。10分钟过去了，邱少云还是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严守纪律，咬紧牙关，双手深深插进泥土中，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

邱少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第9连战士。1952年10月11日晚，他参加所在的部队潜伏391高地下面的草地时，遭到敌人的燃烧弹袭击，邱少云伏在原地，严守纪律，咬紧牙关，双手深深插进泥土中，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

邱少云用年仅26岁的生命铸写了他对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的忠诚。1953年8月30日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罗盛教勇跳冰窟、救助儿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广大志愿军将士，深入朝鲜国土，热爱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与朝鲜人民和军队，团结奋战，表现了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罗盛教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于1951年4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任志愿军第47军141师侦察队文书。在朝鲜他曾参加了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在朝鲜前线，他亲眼目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他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朝鲜人民的深切同情。

罗盛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31年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某部侦察连文书。

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深情厚谊，更使罗盛教深受感动。一次，部队在一个风雹交加的黑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位朝鲜老大娘顶风冒雹地站在那里，手提保险灯为战士们照路，并不断提醒志愿军战士们：别掉进泥坑里。罗盛教认为只有用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

才能报答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他几次要求上前线，可是指导员总是耐心地劝说他：“你的决心是好的，可是革命工作有分工，你正担任文书工作，对消灭敌人是有保证作用的！”罗盛教更加努力地工作，除圆满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经常冒着炮火到前沿阵地为战友送饭，抢救伤员。一天，连观察所附近的山村遭美军飞机轰炸，他冒着浓烟烈火，抢救出一位朝鲜老大娘和一名儿童。在朝鲜的日子里，罗盛教时时感到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他和驻地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的老乡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经常帮房东大妈担水、劈柴，乡亲们夸奖罗盛教是好样的。1952年1月2日清晨，罗盛教和战友宋惠云一起去河边练习投掷手榴弹。正值隆冬季节，河面已被厚厚的冰雪盖住，4名朝鲜少年在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附近的栢沼河上滑冰，笑声阵阵。忽然，从那里传来了呼救声，其中一个名叫崔莹的少年不慎掉入2.7米深的冰窟，另3名少年大声呼救。罗盛教出早操后，路经那里，听到喊声，立即向出事地点飞奔，抓起自己的帽子，往地上一扔，边跑边脱掉棉衣棉裤，冒着零下20℃的严寒，纵身跳入冰窟，潜入水中找寻，跳进了冰河。过了好一会儿，罗盛教才浮出河面，深深吸了口气，又钻进水里。又过了一会儿，罗盛教终于将落水的崔莹托出水面。当崔莹两臂扒住冰面往上爬时，突然，哗啦一声，冰又塌了，少年连人带冰又落入水中。几经周折，罗盛教冻得全身发紫，浑身打颤，难以支撑，体力已快消耗殆尽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再次潜入水中，用尽最后的气力，过了很久用头和肩将崔莹顶出水面。这时宋惠云已将一根电线杆拖到河边，崔莹抱住电线杆被拉上了岸。人们把罗盛教救了出来，但罗盛教因气力耗尽，无力浮出水面，最终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1岁。全村老百姓都赶到了河边，沉痛哀悼这位英雄的志愿军战士。村民们将罗盛教安葬在村庄边的佛体洞山。

为了纪念罗盛教和他勇救落水儿童的善举，1952年2月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表彰罗盛教伟大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特等功臣”的称号。4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决定追授罗盛教“模范青年团员”称号。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追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将其献身的栢沼河改名为“罗盛教河”，崔莹的家乡石田里改名为“罗盛教村”，安葬他的佛体洞山改名为“罗盛教山”，在山上建立了罗盛教纪念亭和罗盛教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四）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

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全国规

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敌我矛盾还很突出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反革命活动，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上号召全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月4日，中共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运动的指示，一场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受贿案件，大多同不法资本家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鉴于这种情况，在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1952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大中城市开展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中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52年10月结束。

这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对工商业者进行了一次普遍的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民主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确保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回击资产阶级反限制斗争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摆在我党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恢复和建设基础设施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从优先恢复和建设基础设施开始的，而抢修和新建铁路又是重点之一。铁路是现代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动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边对已有铁路进行紧张修复，还建设了很多新线。至1952年底，全国新建铁路1320公里，恢复铁路1170公里，修复复线572公里。铁路运输的恢复和发展，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恢复公路。新中国成立前后，仅在1949年就抢修公路26284公里，占已解放地区公路的30%，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768公里。1950年3月，政务院制定了关于修复原有公路、实行分级管理的方针，各地公路交通部门组织人力、物力迅速修复原有公路。同年政务院决定修建以福州为中心的12条华东支前公路，并决定动工兴建通向世界屋脊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1952年11月，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提前通车。至1952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为130276公里，公路质量和通车范围也在提高和扩大。

恢复港口交通。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1年8月决定修建塘沽新港。仅一年零两

个月后，新港就竣工开港，成为中国北方沿海的外贸货运中心，全国近半数货物在此集散。与此同时，青岛、上海、黄埔等港口也进行了修复或扩建，对航道和船厂等开始恢复性整治。至1952年，上海、天津新港和哈尔滨等修船厂恢复正常生产。内河通航里程增加了2.14万公里，沿海除浙江和福建两省因一江山岛、大陈岛等尚未解放需要武装护航外，基本恢复航运。

恢复邮电通讯。从1950年起，邮电建设重心放在沟通以北京为中心的有线干线，建设北京国际电台与整顿北京电话。在此基础之上，恢复水上航运通信，配合军事边防需要赶修若干线路。同时又建成北京至莫斯科的世界最长的陆上有线直达电路。1952年，除西藏、宁夏以外，北京与各省、市间基本已能直接或接转通话，全国约有30%的县城可以与省所在地畅通电报、电话。邮电业务开始深入农村。

兴建水利工程。国家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约7亿元，直接参加的有2000多万人，完成土方量17亿立方米以上。随着治理淮河、荆江分洪、官厅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基本完成，新中国成立前江河堤岸严重失修、水患频繁的状况初步改观。此外，各地还大力整修水渠塘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

（二）稳定物价、统一财经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府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所引起的经济震荡。一大批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致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物价猛烈上涨，经济秩序极其混乱。为了控制市场、稳定物价、制止混乱，人民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与不法投机资本作坚决斗争，先后开展了“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并获得胜利。

视频：《12道密令打响米棉之战》

从根本上解决物价问题，还必须进一步解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问题。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3月3日，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作出九项规定。在各级政府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全国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从财政收支看，1950年全年财政收入65.2亿元，支出68.1亿元，当年财政收支便接近平衡。从全国物价来看，全国主要商品批发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基数，4月降到75.1%，物价基本保持平衡。至此，通货持续膨胀、物价不断上涨的历史宣告结束。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取得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由此开始逐渐形成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毛泽东高度评价稳定物价斗争，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三）合理调整工商业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全面贯彻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促进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为充分发挥私营资本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调整工商业势在必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合理调整工商业工作全面展开。中财委根据中央的部署，着重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三个主要环节，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投放货币以及向农民收购土副产品、扩大城乡交流。

调整公私关系，主要是调整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整个调整工作的重点。政府要求国营经济机构根据需要和可能，对私营工业企业实行有组织的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以解决其原料来源、产品销路、资金周转方面的困难，帮助其恢复和发展生产。调整劳资关系，是指调整私营企业内部劳资关系，主要是解决一些企业发生困难后，资本家停产降薪、欠薪、遣散工人，工人则要求

减薪或发放遣散费，造成劳资冲突等问题。经过调整，私营企业内部逐步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等新型的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主要是帮助私营工业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克服生产的盲目性。

通过调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受到限制，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有了较大发展，部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调整过程中，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工业领域，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以恢复和发展国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重点、带动其他工业的政策。为了恢复和发展国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国家制定和实施的具体政策措施是：第一，增加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第二，制定了以恢复东北为主、兼顾内地的工业布局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利用私营工业有利国计民生的方面，调整其服务方向，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工业发展。由于政策正确和措施得力，1949年到1952年，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140亿元，1952年为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近1.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达49.8%。1952年工业总产值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比1936年增长了22.5%。

在农业领域，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政务院和各地人民政府从当时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出发，在资金、物资、价格、税收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扶持农业生产。第一，国家从财政上尽可能多地安排农用资金，并优先安排农用物资的生产和供应。第二，为了扶持农业生产，国家相应调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第三，为了减轻和稳定农民负担，人民政府先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实行不同

的税制：新解放区实行全额累进税制，取消地方附加；老解放区实行比例税制。第四，国家还实行鼓励垦荒政策、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等。经过认真落实以上政策和措施，在1950年至1952年期间，国家胜利完成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历史任务。

五、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酝酿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怎样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使全国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作了初步规划，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经验的积累，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提纲时，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下来，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载入宪法的序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是不可分离的整体。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来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使新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二）“一五”计划的制定

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国家迫切需要建设一些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项目。因此，在苏联帮助下，制定了1953年至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即“一五”计划。“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历时四年，数易其稿。边编制，边实施。

“一五”计划的特点是：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的国民经济计划，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体现着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较好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一

是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关系。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布局，规定国家在内地安排的基本建设占全国投资额的一半左右；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有 53%分布在内地。“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因而是切实可行的。1952 年至 1957 年，工农业生产都大幅度提高，比例关系协调，市场繁荣，价格稳定，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提高。同时，“一五”计划的实施结果良好，也为以后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编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六、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奠基

（一）以 156 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

从 1950 年开始，中国先后同苏联签订了援建项目 156 项，这就是以后通称的“156 项”。苏联还派出大批专家来为中国提供帮助。“156 项”的主要项目有：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联合企业，长春第一汽车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此外，规模比较大的外援项目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建设的西安仪表厂，郑州砂轮厂；捷克斯洛伐克帮助建设的辽宁电站，影片洗印厂；波兰帮助建设的新中国糖厂和佳木斯糖厂等。

“一五”期间，集中力量搞好由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同时，优先建设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地质勘探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通讯业，以及纺织、制糖和造纸业也相应发展。

思考：“苏联援建与中国取得抗美援朝胜利有关吗？”

（二）工业化的初步成就

“一五”计划迈开了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标志着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到 1957 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

为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基础。旧中国工业不仅生产落后、产量低下，而且发展畸形，主要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基本上没有重工业，许多部门空白，完全依赖外国。1954 年，毛泽东描述当时工业的状况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经过五年的建设，这种状况得到了初步改变，中国已经为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五”期间，中国新建了一系列工业部门填补了许多工业部门的空白。到 1957 年底，经有了载重汽车、高炉、平炉制造设备、汽轮发电设备、拖拉机、精密仪表、石油机械和电讯设备等几十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并开始试制一批新产品，使机械设备的自给能力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20%左右提高到 60%多。在有色冶金工业部门，在生产能力大增的同时，建立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改变了有色金属工业体系残缺不全和互不配套的落后状况。中国还新建立了电子工业部门。“一五”期间，基础工业部门得到大大加强。纺织、食品、造纸等轻纺工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基本上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工业布局得到改善。旧中国工业布局十分不合理，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内地基本上没有工业。经过五年的建设，1957 年底，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已基本建成，并开始了以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为中心的华中和华北工业基地的建设；西南西北地区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石油工业基地的建设也在进行。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建设。适应工业化的进展，城市建设的力度大大加强，建设了一批新的工业城市，原有城市得到改建和扩建。例如，除国家重点建设的新工业城市以外，其他城市也安排了建设项目。尤其是各省会城市，集中了较多的工业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这到 1957 年，国家建设委员会先后批准了太原、西安、兰州、洛阳、包头、成都、大同、湛江、石家庄、郑州、哈尔滨、吉林、沈阳、抚顺、邯郸 15 个城市总体规划和部分详细规划。除国家重点建设的新工业城市以外，其他城市也安排了建设项。尤其是各省会城市，集中了较多的工业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到 1956 年底，“一五”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大多数提前实现，1957 年又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五”计划期间，由于比较正确地处理了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比例关系，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重点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1 年 9 月，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要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大力发展劳动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初级社，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随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期间，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发展过快过猛的现象，1955 年 3 月，中共中央提出分别不同地区，实行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停、缩、发”三字方针。经过初步整顿，合作社缩减了 2 万个，初步巩固了 65 万个社，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恢复，农村紧张局面开始扭转。农业合作化运动经过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保持了稳步前进的势头。195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继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到 1956 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 1.17 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其中 87.8%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4.8%。但其中也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尽管如此，从总体来说，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亿万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历史时期。

（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国家开展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合作化，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其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合作入手，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合作。到1956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发展到10万多个，入社的手工业者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渔业、盐业、民间运输业、小商小贩等个体劳动者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一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步骤地把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而又为国家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并使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然后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与没收官僚资本不同，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和平赎买政策。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3年底以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是1954年到1955年夏，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第三阶段是1955年秋到1956年，主要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基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由此，在中国大陆地区基本上铲除了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根本前提。

八、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指出这次会议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五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强调必须全力实现宪法所规定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建设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的任务。这是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概括。

会议根据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了国家领导机构。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 13 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陈云等 10 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领导机构的建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伟大变革。从反动统治者专制独裁政治到人民民主政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民主制度从此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确定了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和民主程序，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宪法》的诞生

1954 年 9 月 20 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包括“序言”和“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四章，共 106 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二，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等。

第三，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和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权利等。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公民有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的义务，有依法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

第四，规定了国家机构的设置。《宪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职权、作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1954 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由一届全国政协时的180名扩大到559名。会议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宣布：由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今后人民政协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

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一致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16人为副主席，选举常务委员65人。

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政协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人民政协职能的变化，为在中国长期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全国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49年9月，《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这体现了各民族的心愿，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又批准实施政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各族自治区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纲要》的主要内容载入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帮助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2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55年10月，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1956年9月，全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其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五个自治区的先后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重大进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新的伟大创造。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权益，保证了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保证了祖国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制度，从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新中国发展7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九、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一）新型文化教育制度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按照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要求，确定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反动的教育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人民政府对旧有文化教育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并逐步建立起新型文化教育制度。

第一，接管整顿各级各类学校。对旧有教育事业，采取先妥善接收，然后再逐步改造的政策。对原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类公立学校，一律实行接管，废除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废止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公民”等带有反动性的课程；开设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为主的政治理论课；实行民主管理。这为建设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创造了基础条件。

第二，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大力发展小学和中学，吸收工农子弟入学。1950年12月，在北京等地开办22所工农速成中学，为工农干部补习文化，入学工农干部达3700多人。

第三，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文化教育权。1950年10月，政务院下令接收辅仁大学。

第四，改革旧有课程和学制。要求中小学精简课程并改变学制，高校制定并实施新的课程体系。高等学校要以系为培养人才的教学单位，开设课程应适应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在教授系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适当专门化。

第五，调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1953年“一五”计划建设开始后，在北京建立了航空、钢铁、矿业、石油、地质、农业机械、林业、医学等八大学院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政法学院。

第六，大规模开展扫除文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扫盲成为新政权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难题。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农村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农民达2700多万人，参加冬学学习的农民4800多万人，参加速成识字班的700多万人。1956年以后，扫盲运动又掀起两次高潮。

旧有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在改革旧有文化教育制度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人民政府对旧中国的200多万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和“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继续从事自己原来的工作，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对一些代表人物给予一定政治地位。同时，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参加实际斗争，接受教育。1951年

6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联合12位著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希望通过教职员的思想改造来推动学校的改革。随后，这一学习运动推广到京、津各高校。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从京津两市发展到全国，从高校扩大到文艺界、科技界以及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学习，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总的是符合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希望重新学习、转变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的。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开展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在思想上清除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观念，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政治上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极大地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三）科技、卫生、文艺与其他社会事业建设

科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强调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手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提高科研水平。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郭沫若任院长。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了以李四光为主席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以梁希为主席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科学院迅速发展，同时在各地建立分院，拥有120多个研究所。经过积极筹备，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聘任233位有成就的科学家为学部委员，分别建立四个学部，即数理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举行学部成立大会。同年底，全国科技人员已达40余万人，专业科研机构800多个。全国科研体制的形成，科研队伍的扩大，为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长远科学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卫生防疫方面，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实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防病治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同时建立了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加强医学教育，培养医药卫生人员。在全国城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和健全了基层卫生组织、医疗机构及群众性的卫生委员会。陆续消灭了旧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天花、斑疹伤寒等急性传染病。开展血吸虫病防疫工作，治疗血吸虫病患者。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祖国的医学遗产，逐步形成了中西医在防治工作上相互团结、积极合作，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良好局面。到1956年，全国卫生机构总数达10.7万多个，卫生防疫站发展到1464个，妇幼保健站所4564个，城乡卫生医疗网初步建立起来。城乡卫生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

文艺方面，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把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确定为发展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方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随后，分别建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国家倡导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提倡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1953年初，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各文艺协会进行改组，各省市也建立了包括各种文艺工作者的联合会。9月，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将毛泽东为指导戏曲工作提出的“百花齐放”作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如小说《五月的矿山》；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话剧《龙须沟》；新编歌剧《刘胡兰》；电影《翠岗红旗》《智取华山》《上甘岭》；歌曲《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深受群众喜爱，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作用。1951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马可的《白毛女》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扩大了中国文学作品的国际影响。

新闻、广播、出版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1949年8月，中共中央将《人民日报》正式改版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全国公开发行。12月，新华广播电台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后，又实行出版、印刷、发行企业的分工专业化，统一全国新华书店为国营的书刊发行机构，成立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私营出版机构也得到发展。

体育事业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体育成为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通过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迅速攀登世界体育运动高峰。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贺龙兼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积极组建体委等体育工作机构。为了提高中国体育运动水平，国家积极吸纳体育人才，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建立全国运动竞赛制度，开展国际体育运动等。吴传玉1953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游泳比赛中，夺得100米仰泳冠军，这是中国在国际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

十、国防现代化与军队正规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防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此，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并开展了具体的建设工作。

第一，建立国防体制。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全国划分为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东北和华北6大军区。1954年后进一步调整国防体制，由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并

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国家主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务院领导武装力量建设。1954年9月，中共中央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领导军事工作，原国家军委随之撤销。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组成，毛泽东任主席。1955年，全国战略区调整为12个大军区，国防体制的调整和完善，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二，精简整编军队，组建新的军兵种，制定条令条例。1950年、1951年和1954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次整编，到1955年底，全军总员额减到350万人。同时，人民解放军由单一步兵型军队向包括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部队）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诸军兵种合成型军队逐步转变。这是中国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进步。1951年2月，总参谋部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纪律、队列三大共同条令（草案），1953年5月正式颁发试行。

第三，加强军队文化教育和技术训练，创办军队院校。1950年8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决定从1952年起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从1951年起，全军掀起了以学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热潮。为了培养大批军政人才，人民解放军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军队院校建设。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1955年，军队院校已达253所。到50年代末，初步形成了诸军兵种院校齐全，初级、中级、高级院校相衔接的军官培训体系。

第四，实行军官薪金制、军衔制和义务兵役制。1955年1月，中国开始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长期实行的供给制为军官薪金制所代替。1955年9月27日，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粟裕等十人大将军衔。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1956年义务兵役制开始实行。

第五，加强政治工作和群众性练兵，实行民兵工作与预备役工作合二为一。1954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颁布，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各方面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掀起练兵热潮。1955年冬，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地区组织了首次大规模陆海空军抗登陆战役演习，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已达到较高水平。民兵制度是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195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强调“民兵制度必须保留，绝不能取消”。实行义务兵役制后，又建立了预备役制度，后将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使民兵组织得到了加强，预备役工作也有了较大的改进。

第六，加强国防物质技术基础建设。从1953年起，中国先后新建和扩建了100多个国防科技工业项目，国产的飞机、坦克、机枪、火炮及相应的弹药等不断装备到部队，很快实现了军队武器装备制式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发展以导弹和原子弹为主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在大力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国家也加速进行国防工程、国

防交通、国防通信等基本设施建设。

第七，确立军队建设的总任务和保卫国家的战略方针。1953年12月到1954年1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把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此后，军队建设由低级向高级阶段转变，进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时期。1955年，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提上了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日程。1956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保卫国家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提出在未来的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根据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制定的，明确了军队建设的着力点，解决了战略指导的基本问题。

案例：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蓝天“花木兰”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培养女飞行员。1951年初，空军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选调55名女学员，于4月进入牡丹江第7航校学习。这55名女学员被编为第7航空学校第二期丁班。当时，她们使用美制PT-19型和日制“九九”式教练机进行训练。这些教练机十分陈旧，训练器材短缺，加上女学员的生理、心理特点，面临着比男学员学习飞行更大的困难。但她们满怀为新中国妇女争光的信念，以巾帼不让须眉的顽强毅力，全身心投入到学习训练。飞行得跟汽油打交道，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闻到汽油味就反胃。为了克服这个不良反应，她们就把汽油洒在手帕上，经常闻一闻，强迫自己逐步适应汽油的味道。操纵驾驶杆、拆卸发动机力气不够，她们就刻苦锻炼臂力。一次，同场训练的男学员在飞行时发生了事故，她们也没有因此畏缩不前、动摇学飞行的决心。

1951年11月，女飞行员黄碧云、邱以群、戚木木、施丽霞、陈志英、何月娟、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王坚、伍竹迪、秦桂芳14人，仅用7个月就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全部掌握了飞行技术，学成毕业。同期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员41人，也先后毕业，无一掉队。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女飞行员们为首都人民作了第一次飞行表演。飞行表演前，邓颖超讲话说，今天举行女飞行员起飞典礼，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实现。这也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

3月8日11点45分，随着三颗开飞信号弹蹿上天空，14名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女飞行员，驾驶着六架苏式里-2型墨绿色双发运输机，准备从北京西郊机场冲上蓝天，飞向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来自首都各界的7000余名代表和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以及中外记者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当飞机从中南海上空飞过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特意从办公室走到院子里观看。

其后，空军党委常委确定女飞行人员全部留在北京，归空军独立第3团建制，单独编为第2大队第6中队。这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女飞行员中队。经过半年多紧张的昼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女飞行员们开始独立执行任务。由于第一批女飞行员开创了通向蓝天的道路

第二、三、四、五、六批女飞行员也相继完成培训，成为空军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她们驾驶的飞机飞遍了祖国各地，执行空运、空投、抢险救灾等各种任务，为人民空军赢得了荣誉，也为新中国妇女争了光，为祖国争了光。

十一、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一）确立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吃立于世界，为结束百余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创造了前提。

从1948年2月至1949年4月，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重要原则有：一是保护外侨及其国家代表机关，二是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三是维护国家独立自主。这些原则的核心，是实行“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提出，必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外国（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关键是要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

在对外关系上实行“一边倒”的方针，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一边倒”的方针正式公布于世，他说：“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是随着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对国际局势冷静观察和精辟分析，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先后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三大外交方针，为正确处理和发展对外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

（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年10月3日，中苏正式建交。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与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当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国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

动。双方宣布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活动，并充分贡献力量。条约有效期为30年，并可延长。这个条约既针对日本，也针对极力扶植日本的美国，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当时国际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表明了中苏两国相互团结和反对侵略的共同立场，同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对维护东亚地区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条约签订后，中苏在各方面也展开了密切合作。

（三）出席日内瓦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重要国际会议，中国开始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阴谋，以独立的大国姿态走上国际舞台。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主要成员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针是，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力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5月初，越南人民军在以陈废、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下，取得了打败法国侵略军的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此后不久，法国政府更替，对实现印支和平持积极态度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上台在此有利时机，周恩来努力斡旋，在7月21日公布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和《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印度支那全境停火，外国军队必须从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撤军，确认三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从而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长达八年的殖民战争，进一步缓和了亚洲和世界的紧张局势。新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3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中印关系，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并同两国总理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将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1955年4月亚非会议的发言中，周恩来又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此，作为中国和平外交方针完整体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提出“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

1955年4月，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召开的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中国政府积极支

持召开亚非会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4月18日，亚非会议隆重开幕。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方针是：争取和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在会议进行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干扰破坏及与会国之间的矛盾分歧等错综复杂的形势，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加强团结合作。

中国代表团这种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真诚态度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赞扬，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4月24日，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的结尾部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

亚非会议所显示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精神，被誉为“万隆精神”。亚非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通过亚非会议，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被打开，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小结：

从1949年开国奠基到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七年，是凯歌高奏、成就辉煌的七年。在短短的七年中，新中国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